

階級關係在私營企業中的建構 ——基於廣州「五反」運動的研究

• 王霞、馬敏

摘要：1952年的「五反」運動是中共將其其在農村的「階級敘事」理論在城市私營企業中進行的一次「複製性」政治實踐，是其階級理論在城市社會中的一次具有「革命性」的擴散與演練。本文以廣州的「五反」運動為實例，深入剖析了中共的階級理論在城市私營企業中複製的運動機理與擴散過程，試圖解讀這一運動對城市社會關係的影響與意義。本文認為，「五反」運動將階級理論深植到了城市私營企業中，消解了資本家與工人傳統的社會倫理和經濟關係，重構了兩者以「階級」為核心觀念的新型政治經濟關係與政治身份體系，由此也徹底顛覆了私營企業中原有的社會結構與政治關係。「五反」運動終結了中國城市私營經濟的發展可能性，消除了「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存在，並為以後全面的公有制經濟體系的建立掃除了障礙。

關鍵詞：「五反」運動 私營企業 階級關係 政治動員 廣州

1952年的「五反」運動是中共第一次在中國城市中發起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造運動。它標誌着中共的革命重心已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而對城市社會的「革命化」改造在二十世紀50年代初已成為鞏固中共革命成果的關鍵。

回顧二十世紀中國的共產革命，首先最應關注的核心概念即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是中共認識農村社會、發動並領導農民進行革命的重要思想和手段。在此種觀念和方法論中，強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道路的根本對立，始終是中共發動和進行革命、防止革命變色的指導綱領和核心意識形態^①。這種觀念不僅用來解釋中國革命的起源、進程和模式，也是革命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用於政治動員的話語資源。學者黃宗智認

* 本文是廣州市社科規劃項目「勞動者的尊嚴：社會主義改造中工人階級的心態研究——以廣州市為個案（11Q4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為，「官方認可的農村階級鬥爭話語，不僅成為階級話語中的主導，而且統治了整個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所有話語。直到文革結束之時（期間只有在大躍進之後出現過一段短暫的回潮），政治一直主導着所有的生活領域，而在政治話語中，階級話語又佔據着最突出的地位。它成為這一階段裏幾乎所有群眾運動的引導力量：從土改到『三反』、『五反』，從社會主義改造到反右運動，直到最後的作為文化大革命前奏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②。

關於中共在農村中階級關係的建構與實踐情況，學術界已關注頗多。儘管存在爭論，但學界還是承認這一事實：中共通過「階級敘事」成功實現了對鄉村社會的滲透改造與資源分配^③。從革命的進程來看，中共對城市的改造是其「農村革命經驗」的推廣與演練。正是沿着這樣的革命邏輯，中共也成功地改造了城市社會。本文以廣州「五反」運動為考察中心，重點關注「階級敘事」如何改造了城市私營企業，即中共如何建構了城市私營企業中的資本家與工人的階級關係並對私企完成革命化改造，以及這種建構對於私營企業的內在結構與社會關係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一 廣州「五反」運動的緣起與歷程

關於中共在農村中階級關係的建構與實踐情況，學術界已關注頗多。儘管存在爭論，但學界還是承認這一事實：中共通過「階級敘事」成功實現了對鄉村社會的滲透改造與資源分配。從革命的進程來看，中共對城市的改造是其「農村革命經驗」的推廣與演練。

在中共建國初期的政治運動中，「三反」、「五反」實際上是一項政治運動的兩個不同階段：第一階段是「三反」時期，從1951年11月1日到1952年2月中旬。此階段的鬥爭對象主要在黨、政府機關和軍隊內部；第二階段是「五反」時期，從1952年1月26日至10月25日。此階段是「反擊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主要在全國城市中集中打擊資產階級^④。「五反」運動是建國初中共在城市私營企業中發動的一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從運動的源頭來看，「五反」運動是「三反」運動的「衍生品」。就學界的研究來看，「三反」運動的最初動機是由於朝鮮戰爭導致的財政困難，由財政困難而增產節約，由增產節約演變成了「三反」^⑤。「三反」就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主要在中共黨、政、軍機關展開，重在解決中共幹部的腐敗問題。在清理幹部隊伍時，中共高層發現幹部的腐敗與工商企業界有緊密的關係，而當時這一領域仍然是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佔據了主要份額，所以必須對資產階級「興師問罪」。於是運動轉向，由「三反」轉向「五反」，資產階級成為重點打擊對象。從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到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關於結束「五反」運動的報告為標誌，這場運動歷時九個月之久。

同中國的其他城市一樣，廣州也開展了空前的「五反」運動。其運動歷程大體上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1952年1月底舉行廣州市第四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至4月7日，這是運動準備和試點階段。「五反」首先在新藥工業、新藥商業、植物油業和糧食加工業等四個行業展開試點。

二、4月7日舉行全市各界人民展開「五反」鬥爭大會至4月底，這是運動的大規模推進階段：運動已在20個重點行業的3,827戶和72個一般行業的10,658戶中

展開；「五反」運動委員會處理了90個行業中大批中、小戶以及能徹底坦白的嚴重違法戶；被寬大處理的私營工商戶為感激政府，紛紛組成了工商界的規勸隊以立功贖罪。

三、5月7日至5月底為「五反」鬥爭的全面鋪開時期，主要採取的運動方式包括：以指揮所為單位將資本家集中起來並進行互評互擠；放手發動普通工人、店員並爭取高級職員對資本家進行檢舉、控訴；組織各方面力量展開「勸降」工作；將資本家的資料掌握詳盡，組織檢查隊，隨時對頑抗不降的資本家實施最後檢查。這一期的運動結果是，被鬥爭的4,700多工商戶中絕大多數都交代了「五毒」行為。

四、6月1日至6月20日運動轉入到定案處理和成果總結階段，也為以後的私營企業改造打下基礎⑥。

廣州在「五反」運動中共扣押63戶，79人。到1954年，刑滿釋放21人，刑期未滿保釋的2人，在押的56人。由於運動開展速度快，也較為激烈和過火，造成了較多的冤假錯案，很多資本家在運動結束後要求重新定案。據統計，到1954年6月，廣州就有222戶要求翻案⑦。

回顧整個運動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廣州開展的「五反」運動是對中央運動政策的高度、及時和有效的響應，運動的實際運作程序也與中央的要求呈現高度一致性。自然，運動的最終結果也完全滿足了上層的政治意圖，而運動的激烈性特徵更是「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實踐體現。這種運動模式也正是中共在農村發動政治運動經驗的總結與在城市中的進一步運用。那麼，廣州「五反」運動的基本運作程序是怎樣的？「階級鬥爭」如何在中共初執政的新政治環境下在城市中展開？階級意識又是如何通過「運動」而被灌輸和喚醒？運動的短期效果和長期影響又是甚麼呢？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能清晰地再現中共如何通過運動模式重構城市私營企業中的資本家與工人的階級關係，並對私企完成革命化改造這一歷史圖景。

廣州開展的「五反」運動是對中央運動政策的高度、及時和有效的響應，運動的實際運作程序也與中央的要求呈現高度一致性。自然，運動的最終結果也完全滿足了上層的政治意圖，而運動的激烈性特徵更是「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實踐體現。

二 「五反」運動前廣州私營企業中的社會關係狀態

早在1950年，廣州市政府就在各類私營企業中全面建立了工會、勞資協商會議和進行了民主改革。但在「五反」運動前，這些私營企業中工人的階級意識普遍是很淡薄的，他們對新型工會的認識也很模糊。根據1951年對全市九個區（太平、惠福、永漢、長壽、荔灣、河南、大東、芳村、西村）的不完整統計，共有店員36,565人，參加工會的有27,134人⑧。一般店員對自己所屬的階級身份認識模糊，有些店員則與資方保有密切的依附關係。例如，有些店員認為：「老闆依靠工人力，工人依靠老闆食」；「老闆是火車頭，工人是火車卡」。有的店員把「工會當作是保險機關、失業介紹所，視工會證為護身符，領了工會證便萬事大吉，有的認為工會是單純搞福利的，開會不講福利就沒興趣，對政治時事不太關心」。店員對資本家也非持有階級敵對態度：「一般店員都怕資方，登記和參加學習要看老闆臉色，填表也是偷偷地，工作隊找他們談話，如有老闆或與

在廣州的私營企業中，普通工人並未從「階級」的角度來認識自己與資本家的經濟和社會關係，普遍仍是從傳統的倫理和利益方面來界定僱主—僱員身份及其關係；更多地是認為自己的生存與老闆休戚相關，打倒了老闆，自己也就失業了。

老闆有關的人在場就不敢談話，或說沒有時間，對參加工會怕發生勞資糾紛，認為老闆是親戚，不好意思參加。」^⑨由於私營企業的行業特性，也有很多店員與資本家保有師徒或親戚關係，具有很強的倫理色彩，如所謂的「五同」關係（同姓、同宗、同學、同事、同鄉）。與資本家關係密切或掌握資本家重要資料的店員尤其如是。從檔案資料來看，當時的工人通常把自己與資本家視為一種正常的「僱傭」關係而不是中共所想要的「階級」關係。

由於工人的階級意識淡薄，他們最初對「三反」、「五反」普遍表現冷漠。他們認為：「三反是幹部的事，是政府的事，主要是整黨，店員無錢過手，三反和店員無關；對不法商人的行賄、偷漏仇恨不足，說：廣東人就是這樣狡猾的了，回佣送禮是商家慣例，不算行賄。」有的甚至認為「三反」、「五反」開會浪費時間，說：「我知道資方造假賬，我就不檢舉。」^⑩

總之，在廣州的私營企業中，普通工人並未從「階級」的角度來認識自己與資本家的經濟和社會關係，普遍仍是從傳統的倫理和利益方面來界定僱主—僱員身份及其關係；更多地是認為自己的生存與老闆休戚相關，打倒了老闆，自己也就失業了。

三 階級關係的建構：中共的動員策略與運作機制

要清除和打破工人舊有的社會意識和「五同」關係，就必須在工人頭腦中灌輸中共的政治意識，其關鍵就在於通過塑造工人的階級意識與政治身份來建構出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階級對立關係。檔案資料顯示，廣州市私營紡二廠（時為廣州規模較大的私營紡織工廠）、一中煙廠（時為廣州規模較大的私營煙廠）、協同和機器廠（即現在的廣州柴油機廠）三間私營廠通過發動工人檢舉資本家的辦法，曾被當時奉為運動的「典型」，作為經驗加以總結與推廣^⑪。以下的分析主要基於三間私營廠的運動經驗，通過這些案例，就可以具體考察出中共主要透過三方面發動工人打倒資本家，並使工人實現了「階級自覺」——階級意識的自我覺悟。

（一）階級思想的教育：店員「歸隊」

在「五反」運動中，中共很清楚，要摸清資本家的底細，掌握資本家所謂的「不法行為」，有賴於會計、業務、管理等部門職員的大力配合。因此，如何爭取到私營企業職員便成為動員工作的重中之重。但這些部門的職員（中共視之為高級職員）大多與資本家有着密切的關係，他們對於反對老闆存有很大的顧慮：其一是怕連累。資本家許多不法行為是職員經手做的。若是檢舉了資本家，怕他們反咬一口，把責任推到職員身上；其二是怕撕破情面。多數高級職員不是資方的親戚朋友，便是資方一手栽培的，「如一中煙廠馬柏榮是經理陳東一手從普通職員提拔為經理科主任的，紡二廠檢查科長侯湘鑒、計劃科長江海濤是該廠前經理送他們去美國，學習技術回來的。」因而不便檢舉；其三是怕報復。手上不乾淨的職員更容易背上包袱，不敢檢舉。所以，「五反」之初，工人與資本家並沒有形成水火不容之勢。有的工人還靠攏資本家，替資方辯護，「如紡二廠

物料間主任說：死也要跟資本家走，而計劃科長說，我中立，即不檢舉資本家，也不包庇資本家。」因此，中共必須對私營企業工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階級教育、前途教育，才能從思想上發動與組織工人、店員積極參加到「五反」運動中來。具體的措施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政治上高調認定私營企業高級職員屬於工人階級，以此確定他們與資本家階級相對立的政治身份。這種階級宣傳事實上在悄悄改變着工人的認知。有些職員就迫切想成為工人階級，「如一中煙廠經理科主任馬柏榮常因工人說他是資方的人不願和他接近而感到難過；協同和業務主任黃迴常聽到工人說他不是工人階級而感到痛苦。」因此，肯定他們的工人階級身份，是打破「五同」關係的重要一步。

其次，讓職員認清資產階級的本質，從而與其劃清界限。如一中煙廠資方給部分高級職員秘密津貼，有的給多，有的給少，造成職員之間相互猜忌。有的資本家甚至威脅職員，有的乾脆把責任推給職員。如一中煙廠資方將賄賂人民銀行幹部的事推到經理科主任馬柏榮身上，把偷換煙葉的責任推給管理員陶豐林身上。這些事件大大影響職員心目中資本家的形象，也讓他們認清了資本家的本質，從而會主動與資本家劃清界限。

第三，通過國家權力為高級職員撐腰，以消除他們的思想負擔。工作隊一方面反覆向職員說明政府對「五反」運動必須進行到底的決心和對工人檢舉持撐腰保護的態度，另一方面則是禁止不法資本家藉故關廠歇業，開除工人。此外，還特別強調說明那些曾被資方引誘、蒙蔽、欺騙以致手上不乾淨的工人都是受到資本家的教唆，只要坦白出來，一律都不予追究。

通過這些革命運動中慣常使用的「胡蘿蔔加大棒」策略，促使了很多職員「歸隊」：他們不再是資本家的幫兇而成為革命的工人階級一份子。例如一中煙廠經理科主任大聲高呼：「我做了上十年資本家的俘虜，今天我站起來了！我回到工人階級隊伍來了！」事實上，很多對資本家不法行為知情的職員的確從資方反叛出來了，這為「五反」運動的開展打開了突破口。

個別打通思想通常是相對私人性的交流，如一對一，以區別於集體性活動；交流的內容是宣傳官方的政策、態度和措施，而其性質則可能包含激勵性和懲罰性。因此，被交流者通常在誘惑和威脅的雙重影響下會作出認知和行為上的改變。

(二) 動員的行動策略：個別打通與集體推動相結合

在「五反」運動中，動員的行動策略還體現了個別打通與集體推動相結合：

首先，個別打通思想實際上就是指具有某種正統、權威的人員對動員對象進行思想灌輸，以改變對現狀的認知並要求在行動上作出相應變化的過程。這種方式包含一系列的內容：它通常是相對私人性的交流，如一對一，以區別於集體性活動；交流的內容毫無疑問是宣傳官方的政策、態度和措施，而其性質則可能包含激勵性和懲罰性。因此，被交流者通常在誘惑和威脅的雙重影響下會作出認知和行為上的改變。例如，「協同和廠會計主任梁可端經過無數次大會、小組學習都無動於衷，態度和行為都沒有變化。後來副會計主任專門找他談話說：你不再檢舉，說不定工人要把你當工賊辦的，你要想想前途啊。結果，第二天他就進行了檢舉。」

其次，集體推動主要是利用群體製造「壓力情景」，渲染鬥爭氣氛，其公開性和儀式化特徵極為明顯，這是大規模採取行動並達成運動目標的有力方式。

檢舉坦白和批鬥大會是摧毀資本家心理防線的最後一環。通常這種大會具有極強的儀式化色彩，在製造了一種強烈的「壓力情景」後，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實際上都不得不服從會議儀式的所有安排和角色需要，因而很容易獲得組織者想要的任何結果。

在「五反」運動中，集體推動主要有以下幾種具體做法：一、車間大會。車間大會主要是在工作組的指導下由工會出面來組織的。如紡二廠工人在車間舉行大會，通知職員參加。在大會上，說明工人一定會支持鬥爭資本家，要求大家在大會上共同表態；二、座談會。工作組的工作人員會針對職員不同的思想情況，召開不同內容的座談。座談時，工會還會派工人骨幹參加，在會上對職員進行批評；三、點將。紡二廠工人點將，職員回答。如青花間工人寫信給技術員葉均元，要求其公開答覆關於壞棉換原棉的問題，迫使其在會上不得不起來回答；四、發動工人進行家屬工作。紡二廠工人組織家屬組到檢查科長侯湘鑾家去，說服了他老婆，他的老婆又說服了他；五、挑戰與應戰。一中煙廠男工提出「臨陣不退縮，堅持鬥爭到底」的口號向一個切紙老技工挑戰，他又以「決不服輸」的應戰口號向女工挑戰。紡二廠工人用一幅大紙寫成挑戰書貼在職員辦公室和宿舍，給職員刺激很大；六、誓師大會。在舉行檢舉坦白大會前夕，紡二廠、一中煙廠都舉行了莊嚴的誓師大會。工人在毛主席像前，高舉緊握的拳頭，用堅決洪亮的聲音宣誓：「堅決接受黨和工會的考驗，站穩階級立場，打消顧慮，站在鬥爭的最前線，和資本家的不法行為展開面對面的鬥爭，做一個光榮工人階級戰士，不獲全勝，誓不收兵。」

這幾種集體推動形式，基本都是由派遣到企業、代表政府發動「五反」運動的工作組出面組織，並由工會協同進行。工作組主要是擬定集體推動的形式，工會則主要組織工人進行各種挑戰與鬥爭。經過上述一系列的鬥爭安排，職員（特別是高級職員）被發動起來了，紛紛積極檢舉資本家。至此運動的關鍵業已突破，資本家與職員間原有的社會關係斷裂，人們不再顧忌面子與交情。對立的鬥爭關係撕掉了原有的人情面紗。這也為隨後的檢舉坦白大會做好了準備。

(三) 最後的審判：檢舉坦白與批鬥大會

檢舉坦白和批鬥大會是摧毀資本家心理防線的最後一環。但要開好這類大會，達到從心理和實際上徹底擊垮資本家的防線，則要精心的策劃與準備，例如：

首先要對職工（特別是高級職員）進行充分的思想發動。發動職員要從三個方面着手：其一，要大張旗鼓宣傳「五反」意義；其二，要明確交代政府對職工檢舉給予撐腰的政策；其三，要揭發一些資本家的不法行為，以啟發職工。其次要讓革命群眾明確大會的真實目的。目的有兩個：其一，檢舉資本家的不法行為和他們進行面對面的鬥爭，以打擊資本家的氣焰；其二，通過事實教育群眾與資本家劃清界限。第三是做好會務準備工作，如通過勞資協商會議正式通知資本家準時參加大會，將組織好的材料提到原則高度（階級對立、敵我矛盾）來分析和批判，會場布置要莊嚴以顯示其鬥爭氣氛。第四則是會場控制，如大會當中要監控群眾情緒偏好，控制被批鬥者做坦白交代的時間，指定專人負責高呼口號，同時要配合發言內容，如台上講的是關於偷工減料方面的問題，下面就喊「反對偷工減料」的口號。最後要做好大會總結，時間不宜長，主要是鼓舞職工的鬥志，對資本家的不法行為加以分析、批判，說明政策。

通常，這種大會具有極強的儀式化色彩，在製造了一種強烈的「壓力情景」後，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實際上都不得不服從會議儀式的所有安排和角色需要，



工人鬥爭資本家的場面

因而，很容易獲得組織者想要的任何結果。而且這種批判大會是當時打倒資本家比較重要而又普遍的一環，也是廣州「五反」運動中比較常見的批判大會。

比如星光火柴廠（廣州最大的私營火柴廠，由四名股東合股經營）所開展的批鬥大會就很好地展現了這種會議儀式所產生的政治效果^②：

晚上7時，時限已到，幾個資本家交出坦白材料。……會場上早已熱氣蒸騰。……檢查組宣布其中一人交代比較老實，可以坐下開會，其他幾人違法行為較多，態度狡猾，因此只能站着。……工人上台揭發，高級職員也上台揭發，……資本家不交代罪行，過不了今天的「鬥爭關」。幾個老板的妻子也強死強活地吵：「你不坦白，將來坐牢，叫全家大小怎麼過？你不想家庭好嗎？你想清楚啦，不用顧慮退贖問題，……如果你不坦白，拉去坐牢，我也不看你了！」這時，……已經過關的資本家，組成「工商界規勸隊」，……勸說他們快快坦白。

在經過大量艱苦的實際工作和廣泛的宣傳活動後，中共成功地消解了資本家與工人原有的社會關係，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倫理或實際利益關係被打碎，一種新的政治關係（即階級關係）開始建立起來——工人與資本家成為「不共戴天」的仇人。

在這樣的集體氛圍下，資本家的心裏防線最終被徹底擊潰，紛紛進行了坦白交代，以求得寬大處理。運動組織者的目的自然也在激烈的會場氣氛中達成了。

四 私營企業中新的階級關係的生成

在廣州的「五反」運動中，中共的階級分化鬥爭策略的確產生了明顯實效。據不完全統計，僅到1952年3月，「工人檢舉案件已達三萬七千多件（在基層工會未上報的還不計在內），已檢舉出盜款一億元以上，情節重大的不法奸商有三百六十餘家。據市節儉會辦公室不完全統計，經檢舉和坦白出的數字，總共國家

「五反」運動是中共第一次在城市私營企業界發動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這場運動不僅影響和改變了私營企業的產權制度，更重要的是它徹底改造了私營企業中原有的社會結構與政治關係。

遭受損失五千五百五十餘億元。」^⑬而且，很多店員、職員在經過強大的階級思想教育後，紛紛打破情面和「五同」關係，認識到「親戚歸親戚，階級歸階級」，檢舉了不法的親戚、兄弟、叔伯、舅舅或所謂「恩人」的奸商。例如，「仁康藥房店員工人斬斷『五同』關係面對面檢舉不法奸商湛露明（仁康藥房總經理）」這一事件被視為當時工人檢舉自己親人的典型：

仁康藥房會計湛松堅，這一位在「五反」運動中提高了階級覺悟的上層店員，打破了「五同」關係，第一個站起來跟該店不法老闆（他的堂哥，已經宣布脫離關係）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你的坦白與所犯的罪行，不及十分之一」，「你不僅沒有好好的坦白你的罪行，反而陰謀破壞五反運動。你大量逃避資金往香港澳門，你只講了小小的數目。你在香港澳門大天二開設仁康藥房，你在香港與國民黨殘餘匪幫合夥做生意，你的錢是哪裏來的？」仁康藥房另一位店員也同樣大義滅親：「黃風娟也站起來向奸商提出嚴正的警告：我已經公開宣布和你脫離關係，我不再承認你是我的義父。我再警告你，如果你不徹底坦白認罪，你就是自尋死路了！」送貨員袁蘇（湛露明的妻舅）、文書黃志勉（湛露明的乾兒子）以及過去與「奸商」湛露明有密切關係的櫃面店員王權、審核鄭連傳，他們都撕破情面、劃清界限，大膽檢舉老闆的不法行為^⑭。

一時間，檢舉揭發親人成為政治積極的典型，官方報紙自然連篇累牘地宣揚這種店員打破「五同」關係、檢舉親人的「光榮」事迹，如〈吳綺婷與她的不法父親脫離關係〉、〈龐業抗堅決與不法哥哥作鬥爭〉、〈檢舉走私犯——我的母親高亞美〉^⑮。同時報紙也大肆報導「五反」中湧現的「工人鬥士」，如〈出色的工人戰士陳清〉、〈戰鬥不倦的陳欣尚〉、〈勇敢鬥爭的女戰士陳六妹〉、〈宣傳鼓動的能手張盈賞〉^⑯。整個社會洋溢着打倒資本家的戰鬥氣氛，社會最基本的親情關係被這種鬥爭活生生撕裂。

在經過大量艱苦的實際工作和廣泛的宣傳活動後，中共成功地消解了資本家與工人原有的社會關係，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倫理或實際利益關係被打碎，一種新的政治關係（即階級關係）開始建立起來——工人與資本家成為「不共戴天」的仇人。

五 階級鬥爭在私營企業中實踐的綜合後果

「五反」運動是中共第一次在城市私營企業界發動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這場運動不僅影響和改變了私營企業的產權制度，更重要的是它徹底改造了私營企業中原有的社會結構與政治關係。廣州作為當時全國第三大工商業城市，其運動後果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這場運動對於中國民族工商業所具有的某些歷史意義與深遠影響。

（一）新的政治關係建立：資本家與工人的階級對立

在原來的私營企業中，往往是經濟關係與倫理關係同時並存：一方面是僱傭與被僱傭的關係，另一方面是充滿感情色彩的人際關係——這種情況在當時

的中小型私營企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因為老闆和職員間常常存在着師徒關係或親戚關係。「五反」運動中，中共建構了工人與資本家之間新的政治關係，即用「階級」關係取代了以前的「五同」關係。中共讓工人認識到老闆與工人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並對僱主與被僱傭者之間的權力關係進行清算。通過「階級教育」、「前途教育」、「誰養活誰的教育」，國家成功解構了工人與資本家的倫理關係。自此，工人與資本家之間只有階級對立，再無倫理情分。於是出現了小舅子檢舉姐夫，姪子檢舉堂叔，同鄉、多年老友檢舉老闆的積極份子。甚至有的工人感嘆說：報紙上所說檢舉親戚，我一向不相信，今天親眼見到，可相信了，現在我認識到「只有階級立場，沒有親戚立場」^⑩。

這些與資本家有近親關係的工人往往是工廠、商店的高級職員、店員，他們對資本家的財務狀況與買賣行為相當熟悉和了解。正是這些政治積極份子的全力配合，才使得國家在「五反」運動中擊中了資本家的要害，使得他們毫無招架之力，只得束手就範。

(二) 資本家對企業的管理權威被徹底摧毀

「五反」運動以前，私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工人也沒有對資本家集團作出甚麼具有實質意義的鬥爭，因而資本家階級還保持着原有的地位和尊榮。但「五反」鬥爭極大地喚起了工人高度的「階級自覺」，「五毒」罪名使資本家在絕大多數私營企業中已威風掃地，資本家也放棄了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權，甚至表現出濃重的消極經營情緒。據當時的資料記錄，「針織業資本家整天早出晚歸，不回廠不關業務。棉昌廠，工人找老闆開協商會議，老闆說：『不要協商，你們怎樣決定我怎樣執行。』」^⑪「機器業的大中廠資方一般均存在完全依靠政府，少理業務，以為關了門也無所謂，到處可以找到工作，因此採取吃光態度。東亞廠資方說：『五反前工廠可以說是我的，五反後工廠不是我的了。』」^⑫

與資本家有近親關係的工人往往是工廠、商店的高級職員、店員，他們對資本家的財務狀況與買賣行為相當熟悉和了解。正是這些政治積極份子的全力配合，才使得國家在「五反」運動中擊中了資本家的要害，使得他們毫無招架之力，束手就範。

(三) 資本家與工人政治地位的倒轉

當階級關係在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建構起來之後，工人與資本家的政治地位發生顛覆性的變化：資本家的權威不復存在，甚至這個階級成為讓人感到恥辱的階級；工人的政治地位則迅速飆升，成為企業的主人、國家的主人。

「五反」期間，各種形式的批判會、鬥爭會徹底打倒了資本家的權威，同時賦予了工人極大的政治心理優勢，工人開始對資本家產生了嚴重的階級歧視。檔案資料表明，「五反」運動中後期及以後，工人開始公開蔑視、嘲諷資本家，並為自己屬於工人階級而感到由衷的自豪：「成昌行召開鬥爭大會後，積極份子湧現，情緒高漲，檢舉信每日增加一倍，工友說：『開一次鬥爭會比學習一個月收效還大』。紡二廠開過坦白檢舉大會後，工人說，『原來我們的資本家是老虎精，老虎王呀。』永垂行召開了勞資見面會後，工人反映，工人階級真正當家了，當到鋪頭了。三月二日開過一萬人以上的反對抗拒五反奸商的鬥爭大會

後，許多工人都說：第一次看到資本家在工人面前低頭，今天才感到工人當家作主，也看見自己的力量偉大。」^②

當階級關係取代倫理關係後，資本家在政治身份與社會地位上也就發生了顛覆。自此在社會分層體系中，資本家成為較低位置佔有者，而工人成為國家的「主人翁」。工人在政治心理優勢的支配下，不尊重老闆，甚至公開侮辱、打罵老闆，形成一種「職員不像職員，老闆不像老闆」的怪異景象。根據檔案資料，「大光電器行工友支錢不經會計出納的正式手續，說經過這種手續是向資方低頭。很多次店裏煮了飯，工友不吃，要取回飯錢，又不願做工，每天睡到十一時，都不起牀，使資方承接到的工程不得不轉交別人去做。資源鐘錶店工友以威脅的態度對老闆說哪一號老闆被扣，哪一號老闆被打，你要小心啊。」又如「惠來號工友因老闆拿錢交稅，不借工薪，把老闆大打一場。太平運輸行工友已經透支兩個月工薪，要再透支一月，資方不肯，便把老闆面部打傷。全光水電行工友打老闆說，店鋪是工友的，不是老闆的。寧球記鐘鋪工友把老闆壓在鋪樓上，三餐不准吃飯」^③。

「五反」運動在資本家與工人之間成功地製造了對立的「階級壁壘」，即構建了以「階級」為標準的政治身份體系。在這種身份體系中，資本家成為「政治賤民」，工人則成為「國家主人」。

六 結語

作為建國後中共在城市私營企業中發動的大規模政治運動，「五反」運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五反」運動的模式與中共在農村進行的政治運動如出一轍，是中共「階級敘事」理論在城市私營企業中進行的一次「複製性」政治實踐，是其農村運動模式在城市進行的一次演練與擴散。「五反」運動證明了中共階級理論與階級鬥爭模式在城市的有效性，展現了其農村運動模式的巨大威力與普遍的經驗價值。這成為建國後中共改造城市的有效的路徑依賴。於是源於農村、成功於農村的革命運動模式，就被複製性地運用到了城市，並成功改造了城市的社會結構與政治關係。

「五反」運動以「階級敘事」的革命邏輯重建了私營企業中的社會關係與資源分配方式。「五反」運動打破了私營企業中舊有的僱傭經濟關係和具有倫理色彩的「五同」社會關係，在資本家與工人之間成功地製造了對立的「階級壁壘」，即構建了以「階級」為標準的政治身份體系。在這種身份體系中，資本家成為「政治賤民」，工人則成為「國家主人」。私營企業中原有的以資本家為核心的「權威大廈」倒塌，徹底改變了原來以市場為基礎的運作機制和經濟結構。結果是資本家無論在心理上還是在實際上都放棄了對企業的真正佔有——資本家再也無法翻身了。

從中共以後對城市進行的一系列改造來看，廣州的「五反」運動也是解讀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提前完成的一個很好的歷史切角。1953年6月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為社會主義改造擬定了時間表，即用十到十五年時間來完成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後來卻於1956年初（也就是提前了十二年）就完成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儘管這是多種因素的結果，但有學者還是認為，「五反」運動為日後工商業改造的迅速完成，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經

濟和社會基礎。因為，「運動過後，雖然中共放了工商業者一馬，沒有斬盡殺絕，但已經從政治和道德上公開判處了他們的死刑。」^②同時，也在經濟上對工商業者予以了徹底剝奪。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三反五反』運動為日後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在政治上鋪平了道路，在客觀上使得中共改變原本預定五十年的過渡期，加快向社會主義的轉變。」^③

註釋

- ①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頁22。
- ② 黃宗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從土改到文革時期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載黃宗智編：《中國鄉村研究》，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83。
- ③ 參見鄧宏琴：〈包夾：集體化時代鄉村階級鬥爭的運作機制——以山西長治張莊為中心的考察〉，《開放時代》，2011年第12期，頁41-59。
- ④⑤⑥⑦ 參見張鳴：〈執政的道德困境與突圍之道——「三反五反」運動解析〉，《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5年12月號，頁48；47；55；56。
- ⑧ 參見〈廣州市節約委員會關於廣州市「五反」運動總結報告〉（1953年7月），載廣東卷廣州分冊小組：《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廣東卷廣州分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頁102-105。
- ⑨ 〈中共廣州市委關於處理「五反」遺留問題的報告〉（1954年6月3日），載廣東卷廣州分冊小組：《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廣東卷廣州分冊）》，頁201。
- ⑩⑪ 中共廣州市委辦公廳：〈中共廣州市委辦公廳1951年各區店員及工作隊工作情況綜合參考資料〉，廣州市檔案館，3-25-16。
- ⑫ 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反行賄、反偷漏、反欺詐運動加緊進行中，工商界最近思想情況和動態〉，廣州市檔案館，6-14-25。
- ⑬ 以下有關三間私營廠的討論，除了特別註明外，均參考自廣州市總工會：〈依靠工人團結職員檢舉不法資本家——三間私營廠「五反」運動經驗介紹〉，廣州市檔案館，92-61-119、120、121。
- ⑭ 葉曙明：《百年激蕩：20世紀廣東實錄》，第二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頁1096。
- ⑮⑯ 廣州市總工會：〈五反運動綜合報告〉，廣州市檔案館，92-61-1。
- ⑰ 〈在五反戰線上的一場漂亮戰——仁康藥房店員工人斬斷「五同」關係面對面檢舉不法奸商湛露明〉，載廣東省圖書館編：《五反資料》（內部資料，出版時間不詳），頁17。
- ⑱ 參見〈吳綺婷與她的不法父親脫離關係〉、〈龐業抗堅決與不法哥哥作鬥爭〉、〈檢舉走私犯——我的母親高亞美〉，《南方日報》，1952年2月20日、3月1日、3月28日。
- ⑲ 參見〈出色的工人戰士陳清〉、〈戰鬥不倦的陳欣尚〉、〈勇敢鬥爭的女戰士陳六妹〉、〈宣傳鼓動的能手張盈賞〉，《南方日報》，1952年4月16日。
- ⑳ 廣州市財政經濟委員會：〈廣州市私營工商業變化情況〉，廣州市檔案館，100-140-51。
- ㉑ 廣州市財政經濟委員會：〈五反後廣州市私營工商業狀況〉，廣州市檔案館，100-159-52。
- ㉒ 廣州市政協委員會：〈廣州市政協委員會召開民主黨派座談會情況報告：五反後勞資關係問題〉，廣州市檔案館，99-24-106。

王 霞 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馬 敏 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